

刘师博 / 著

红色 银行

从中央苏区
到陕甘宁的金融战线

HONGSE YINHANG
CONG ZHONGYANG SUQU DAO SHAN-GAN-NING DE JINRONGZHANXIAN

刘师博 / 著

红色 银行

从中央苏区
到陕甘宁的金融战线

HONGSE YINHANG
CONG ZHONGYANG SUQU DAO SHAN-GAN-NING DE JINRONGZHANXI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银行 / 刘师博著. —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8.7

ISBN978-7-5577-0307-3

I. ①红... II. ①刘... III. ①中央工农民主政府 - 中
央银行 - 研究 IV. ①F83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5045 号

红色银行

著 者: 刘师博

出 版 人: 张宝东

责任编辑: 解荣慧

装帧设计: 阎宏睿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133(市场部)

0351-4922085(总编室)

E-mail: sch@sxjjcb.com(市场部)

zbs@sxjjcb.com(总编室)

网 址: www.sxjj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21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7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77-0307-3

定 价: 115.00 元



前 言

中央苏区经济史是一门“险学”，研究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在于史料问题。其一，由于中央档案馆、各省级档案馆的开放程度不一，甚至不对外开放，使得学者难以获得丰富的可靠的第一手档案史料。其二，目前所见的史料主要有文件公告、报刊史料和回忆史料三大类。文件公告虽较为可靠，却隐去了相当多的历史细节，报刊史料和回忆史料又不免因宣传或记忆不准确等种种原因而不够可靠。尤其是就经济史料而言，各种准确的公私统计乃是学术研究最重要的起点。但是，战争年代残酷的军事政治斗争形势，使这类史料比较缺乏。

近年来，学界在史料出版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此前不易见到的史料陆续公开。目前所见，有如下几类文献值得重视。其一，大型文献选编。《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斗争史》编写组所编的《革命根据地

财政经济斗争史资料摘编》（1978），许毅主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1982），江西省档案馆和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合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1982），林超编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1982），江西省税务局等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1985），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的《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1986），湖南财政厅编的《湘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摘编》（1986），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90），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1997），王金山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消费合作社史料选编》（200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编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011），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和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编纂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2013）和柯华主编的《中央苏区财政金融史料选编》（2016）等是目前规模较大的史料选编，值得学界进一步挖掘利用。此外，尚有各市、县所编写的革命文

献资料、文史资料等值得关注。其二，重要人物文集、年谱、传记。与本书直接相关的曹菊如的《曹菊如文稿》（1983）和吴亮平的《吴亮平文集》（2009）是最重要的史料，《革命理财家毛泽民》（1994）也收录了部分毛泽民的相关文献。此外，如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集、选集、专集、年谱和传记等也非常值得参考。其三，诸如《红旗周报》《红色中华》《斗争》等报刊史料目前较易获得，是研究此段历史必不可少的文献。如《申报》《大公报》等较为外围的史料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学术史方面，1982年，许毅、金普森、孔永松等学者编纂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人民出版社），为中国近现代史开辟了崭新的天地。此后，“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领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①余伯流是中央苏区经济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有《中央苏区经济史》（1995）、《中央苏区经济建设》（2009）等大量著作。他的《中央苏区经济史》被誉为“中央苏区经济史研究的一部力

^①魏宏运：《立足史料 阐发新见——评〈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年第2期。

作”，“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建立了苏区经济史研究的一家之言”^①。该书视野开阔，立论精到，史料扎实，尤其对苏区开展经济建设的条件、毛泽东经济思想的阐扬很见功力。当然，该书也存在着苏区经济史阶段性的历史性的论述不足，及在当时的学术规范下注释太过简略等问题。1999年，厦门大学张侃、徐长春撰写了《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该书分为中央苏区建立前的地区社会经济、中央苏区的农业生产、工业发展、商业经济、金融体系、财政制度、经济思想和结论等八部分，认为纵观整个中央苏区的经济发展，其生产力水平，无论是经济结构，还是经济运行模式，没有质的飞跃，仍旧是对原有社会经济的继承。当然，中央苏区经济也不是传统经济的简单重复，比如通过改造和开辟两种方式，区域内的圩场经济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南开大学魏宏运教授评价道：“（该书）很注意学术的规范，其开篇即对学界的已有研究做详尽的说明……同时全书贯穿了论从史出的著述原则，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凸显了中

^①何友良：《中央苏区经济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余伯流著〈中央苏区经济史〉》，《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8期。

央苏区经济变化中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更深地认识中央苏区经济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历史地看问题，是该书的一大特色。”^①徐学初的《中华苏维埃经济建设研究》（2008）侧重于1927年8月至1934年10月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苏维埃政府对于局部执政条件下苏维埃经济建设的探索”，并将之划分为初步探索、进一步发展和曲折发展三个阶段，“围绕共产党人和苏维埃政府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探讨中华苏维埃经济建设从创办到逐步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②。该书使用的史料主要以《红色中华》《斗争》等原始史料和上举史料集为主，紧紧围绕苏维埃政府如何解决苏区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这一主题，是这一领域较新的成果。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2015年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八十周年，是年创刊的《苏区研究》双月刊至今已出版16期，是中央苏区研究升温的证明，这必将带动中央苏区经

①魏宏运：《立足史料 阐发新见——评〈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年第2期。

②徐学初：《中华苏维埃经济建设研究·前言》，成都：巴蜀书社，2008，第6—9页。

济史研究的深入。

总的来看，对中央苏区经济史的研究尚有空间，这与史料、视角都有关系。史料的不断披露已如上述，相信在深入挖掘现有史料后，必能有所收获。中央苏区经济史的研究在某些领域已经较为深入，比如中央苏区的合作社运动问题^①、劳动立法问题^②等，但是还有诸多领域有待开垦，红色银行史即是其中之一。红色银行是苏维埃政权得以存续的重要支柱之一，不管在保障红军给养上，还是在促进苏区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目前仅见 1986 年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编著的内部资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简史》。这使得我们对红色银行的认识还停留在较为浅显的层次，更遑论对银行运行、资本来源、主要负责人等更细微深入的研究。比如，曹菊如是中国共产早期卓越的银

①魏本权、曾耀荣：《民间互助·合作运动·革命策略：中央苏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再研究》，《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 年第 2 期；王明前：《“剪刀差”问题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合作社经济》，《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 年第 1 期。

②李峰松：《中共苏区政权劳动立法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张宗娜：《苏区劳动立法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行家，福建龙岩人，1927 年在南洋印度尼西亚等地参加华侨组织的反帝大同盟，1930 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与创办了闽西工农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银行建设和金融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长征后，曹菊如担任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副行长、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财政厅厅长、中央财经部副部长、西北财经办事处秘书长等要职，为筹集军饷、保障物资供应做出了重大贡献。解放战争时期，曹菊如先后就任冀热辽分行经理、东北银行总经理、东北财经委员会秘书长等职，使东北地区的金融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为统一全国财政金融创造了有利条件。新中国成立后，曹菊如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行长、党组书记等职，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和第八次全国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在恢复上海经济活力、沟通城乡物资交流、研究掌握市场货币流通变化情况、发行新版人民币、稳定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等方面，曹菊如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此重要的人物，除去回忆性或者生平叙述的文章外，竟只有郑学

秋《曹菊如对我国金融事业的贡献》（《党史研究与教学》，1991年第2期）一篇资料。

总之，红色银行史是一个待深入开垦的园地。只有在日益丰富的史料和前人研究的良好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充分了解历史背景，广泛搜集、认真研读史料，才能努力实现历史与逻辑、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兼顾整体把握与细节考辨，避免诛心之论。

本书将围绕着“中央苏区重建金融体制”“中央苏区各银行的建立和巩固”“红色银行的货币发行”“红色银行与财政统一”“红色银行的资本来源”与“长征路上的流动银行”等六个部分展开，尝试解答红色银行何以在中央苏区创建，又发挥了什么作用，并如何在西北转生等几个问题。本书稿得成，一方面得益于先进学者的成果（恕不能一一注明），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出版社诸君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读者还须注意，作者本人学历尚浅，又成书仓促，只能留待来日修订，敬请以批评指正的态度对待后学。

目 录

第一章 中央苏区重建金融体制 / 001

第一节 中央苏区建立前的社会经济 / 002

一、自然地理与经济条件 / 004

二、传统的经济形态 / 007

三、土地制度及其恶果 / 009

第二节 旧金融体系及其危害 / 015

一、以帝国主义国家银行为代表的旧金融体系 / 016

二、旧金融体系对中央苏区的危害 / 025

第三节 金融体系的新陈代谢 / 035

一、废除旧金融体系的措施 / 035

二、建立红色金融体系 / 044

第二章 中央苏区各银行的建立与巩固 / 054

第一节 苏区各银行的初创 / 057

红色
银行
目
录

- 一、东固平民银行 / 062
- 二、江西工农银行 / 068
- 三、闽西工农银行 / 072
- 四、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 / 085
- 五、湘鄂西农民银行 / 087
- 六、湘赣省工农银行 / 093

第二节 “一苏大”对金融工作的决议 / 098

第三节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 107

第四节 发展信用合作社，巩固工农银行 / 122

- 一、发展信用合作事业 / 122
- 二、平息挤兑风波 / 140

第三章 红色银行的货币发行 / 150

第一节 设计自己的货币 / 150

第二节 苏区的货币制造 / 156

- 一、造币机关 / 156
- 二、印钞机关 / 169

第四章 红色银行与财政统一 / 184

第一节 苏区财政状况 / 187

第二节 从自收自支到统一财政 / 194

第三节 财政制度的规范化 / 205

一、关于预决算制度 / 208

二、关于会计制度 / 210

三、关于审计制度 / 215

四、关于金库制度 / 217

第五章 红色银行的资本来源 / 224

第一节 成立“中华钨矿公司”等公营工厂 / 225

第二节 发行革命战争公债和建设公债 / 244

第三节 熬硝盐运动 / 256

第四节 积极开展信贷活动 / 261

一、存款 / 262

二、放贷 / 265

第五节 节省运动 / 271

第六章 长征路上的流动银行 / 293

第一节 困境：长征前夜的苏区红色银行 / 294

第二节 维持：长征途中的金融举措 / 300

第三节 重生：扎根西北后的新发展 / 303

参考文献 / 320

附录：历史文献资料 / 323

-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 / 323
- 粮食调剂局与粮食合作社的关系 / 324
- 长汀印刷厂工人做出的重要贡献 / 326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 / 327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
训令(第十五号) ——建立关税制度 / 328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劳动人民委员部训令第六号
——为大规模开采钨矿招工 15000 个人 / 332
- 李克怀等回忆 / 333
- 矿产开采权出租办法 / 335
- 中央被服厂情况 / 336
- 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介绍 / 338
- 枪炮厂取得成绩的原因 / 339
- 发行“革命战争”短期公债条例 / 340
- 动员群众购买的办法 / 341
- 浪费的不可容忍的事实 / 342

后记 / 344

第一章 中央苏区重建金融体制

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因时制宜，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农村地区，尤其是几省交界的边远山区，建立了大大小小的革命根据地，比如井冈山、赣西南、赣东北、闽西、海陆丰、琼崖、湘鄂赣、鄂豫皖、左右江、川陕、陕北等。革命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的红军提供了难得的斗争舞台，使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成为可能，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但是，革命根据地艰苦的地理环境和薄弱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其前进道路的曲折艰难。深入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人很快就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而且这种困难将持续困扰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比如，秋收起义后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近严寒，士兵尚着单衣，给养亦日虞不足，加之四面受敌，虽欲筹款，苦无暇日。故此时如无办法救济，该部队恐难久存也。”^①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广东海陆丰苏区财政困难仍是十分严重的。“如财政，全县每月只可收入七千三百元……每月

^① 《苏先骏关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情况向中共中央的报告》，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南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7，第66页。

最低限度使出一万九千余元，收入比较每月不敷一万二千元……财政问题实是异常困难且无法解决的。”^①对此，海陆丰苏区政府只得缩编部队，并向农会发起募捐。

窥一斑可知全豹，苏区严重的经济财政问题威胁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如何摆脱这种经济困窘以巩固苏区是摆在苏维埃政权面前的急务。由此，金融战线的斗争既急迫，又重要，是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和经济斗争的重要方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先破后立，一方面在土地革命中摧毁旧政权的金融体系，废除封建债务关系；一方面着手创办红色金融机构，发行苏维埃货币，建立新的信贷体系。

第一节 中央苏区建立前的社会经济

中央苏区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简称，其覆盖范围也随革命斗争形势的变化而有变动。在一般情况下，这一概念的地域指涉包括赣南和闽西两地。^②1930年夏，中共中央为指导全国的红色斗争，把在事实上尚未连成一片的赣西南苏区和湘鄂赣苏区联合划为中央苏区。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下发了《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工作计划》提出“确定湘鄂赣连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

^①中共海丰县委党史办公室、中共陆丰县委党史办公室合编《海陆丰革命史料（1927—1933）》第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第175页。

^②郭若平、袁超乘：《“中央苏区”概念的地域指涉变迁考》，《东南学术》2017年第1期。